

笔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高静: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很多作品回到了更加重视表现个人、关怀个体的道路上。然而如果一味落入“小我”的趣味,拒绝承担社会责任,也会让其所标榜的人性越来越狭隘、“自我”越来越雷同。难道只有角落里的喃喃自语才表现了人性吗?而人民、崇高和英雄书写就不表现人性了吗?事实上,崇高与英雄从来就是人们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要依托,是人性中真善美的集中表达。因此,我觉得是时候呼唤一种冲破“小我”与“大我”的区隔,走向既是“人学”的又是“人民学”的文学观念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军旅文学所承载和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既关照个体人性、又张扬人民属性的思想、观念和情感。而于1950年代末、两次亲历战场洗礼的徐贵祥,多年来深耕战争历史题材,对于个体生命与战争历史、日常经验与极端经验的体悟和书写都极具个性和深度。长篇小说新作《英雄山》(人民文学出版社),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往作品的叙事风格,塑造的英雄形象也具有某种时代的新质。

《英雄山》分《穿插》和《伏击》上下两部,集中体现了徐贵祥对英雄主题的多重思考。在抗战的历史背景之下,英雄是生成性的吗?普通人身上有没有英雄性?透过形形色色的人物,小说呈现出了丰富的英雄意涵。《穿插》中的主人公凌云峰是英雄的代表。凌云峰有不少缺点毛病,但因为信仰,他能经常反省自己,也正是因为有信仰,他能抛开个人名誉努力维护国共联合抗战大局。从凌云峰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深意,山峰是由地壳运动中板块撞击所形成,凌云峰则象征着它所经历的深重磨难。作者特别选取长征这一军史上最艰苦的阶段来凸显这个人,将他放置在残酷的历史情境中,通过他打不死的“战神”形象,来象征中国工农红军的英雄精神和革命信仰。《伏击》中的主人公易水寒象征的是英雄的成长性。小说聚焦他的心理世界,抽丝剥茧般写出了一个人物如何一步一步成为英雄并最终获得信仰,实现灵魂上的涅槃的曲折历程。

得益于对一手抗战史料的掌握,徐贵祥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让全民集体释放出英雄性素质的内在逻辑。徐贵祥以自觉的态度写出人性中英雄性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促使我们再一次重新审视和理解人性。战争让立场不同的人之间建立起奇妙的情感联结,达成了一种在生死抉择的具体情境下,在战争智慧、民族情感与个人沉思高度契合的情况下产生的灵魂对话。《穿插》中凌云峰与国军军官谢谷在殊死搏斗之前就有一次夜观星星的场景,之后的多次战斗中由于对战术的分析和判断高度一致,二人逐渐形成共同维护抗日大局的默契。真像凌云峰之间、凌云峰与何子非、何子非与张达理、蓝旗与楚大楚之间,也都是因为战争而在灵魂上产生了某种共鸣。

在人物塑造上,各种细节和道具恰如其分的使用,不断将人物拉回形而下的现实生活,显示出主人公身上真实生动的一面。而对于易水寒这个人,徐贵祥写出了他内心世界的丰富驳杂,将一种被封建家庭和封建文化过分压抑了的变形人格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也与他后来潜伏进入红军之后的心理游移、战术上的孤注一掷及灵魂上的最终突破形成了性格逻辑上的统一。

曾有论者批评徐贵祥写得很快,存在一种“习惯的美学风格”。这样的批评自有其道理,但我想说的是,重复并非全无益处。金钱主题之于巴尔扎克,“真相被发现”之于海明威,高密东北乡的民间性之于莫言,不都是一种重复吗?任何一个有抱负的作家都不能忍受自己浅层次的自我重复。如果他忍不住一再重复某些东西,那一定说明这些重复正是他的情感投放之所,是他念兹在兹的精神源泉与写作宝藏。如此来理解重复,我倒不禁为徐贵祥的真诚和坚韧所打动。坚持描写战争小说中的真善美,坚持叙事风格的硬朗超拔,对徐贵祥来说,未必不是一种优势。

凌云峰是两部姊妹篇着重塑造的红军英雄形象。他骁勇善战,在三条山战斗中抱着必死的决心率部穿插敌进攻部队,牵制了敌人四分之一的兵力,迟滞了其对我主力部队的进攻;他足智多谋,在自告奋勇充当人质换回安南父女后,巧妙利用土匪巴根利欲熏心的本性,最终逃离魔窟。他爱国爱党,在各种机缘巧合下成为国军军官楚大楚的替身后,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心同红军共御外辱。但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凌云峰身上必然会有这个年纪特有的稚嫩,比如容易自满、缺乏必要的警惕心等。在徐贵祥看来,塑造英雄形象也无须将其刻意完美化。真实地书写人物的缺点,反而使得人物具有温度、真实可感。国民党军特务易水寒潜入陕北红军部队,但在等待命令的过程中,易水寒逐渐了解了共产党的本质,并被其为民抗战的崇高信仰所打动,在关键时刻调转枪头,保护了中共代表,抱着死而无憾的决心向红军坦白身份,最终得到谅解并正式加入了红军……

小说中几位主要人物在身份和角色上的置换,打破了一般战争小说中“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使得原本处在不同营垒、秉持不同信仰的军人在最后像小河入海一样汇聚到了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这是徐贵祥在塑造英雄形象方面的匠心所在,也展现出他不同于过往创作的新的叙事方向。

孔立文:徐贵祥笔下的英雄,多是血肉丰满的普通人。《英雄山》的可贵之处在于,作家没有止于英雄故事,而是用细腻的笔触,以接接地气的方式,艺术再现英雄的成长路径与心路历程。作家着力观照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判断的多样性,特别关照人物内心的悸动与波澜,在历史视野之下努力探寻英雄人物的成长轨迹。作品中的英雄就在普通民众中间,他们是鲜活的个体的人,既有七情六欲,也有爱恨情愁,人物形象真实可信,合情合理,水到渠成。

一部作品分作两部来写,《英雄山》无疑具有突破性的叙事价值。两部作品一个主题,两个叙事者均采用第一人称,最后又皆转为全知全能的灵魂叙事。多重视角之下,整个故事虽然迷雾重重,谍影丛生,但却立体多面,震撼人心。小说中众多人物关系相互勾连,爱恨情愁交织缠绕,真假虚实精彩纷呈。小说结构精巧,语言晓畅,文字幽默,看似自然随性,信手拈来,实乃饱含匠心,精雕细琢。作品所承载的理想至上、不忘初心的炽热情怀,充分展现了作家对国家、对社会、对历史的责任感。诚然,也正是这份责任感,使得这部具有浓烈家国情怀的文学精品成色更为本真,主旨更为厚重。

回望历史,找寻革命初心。徐贵祥延续了自己一贯以来的英雄书写,始终把塑造英雄形象、弘扬英雄精神作为自己的文学理想和精神追求。以真像凌云峰为代表的因为信仰而无惧生死、不负使命的“穿插英雄”,为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人物画廊贡献了新鲜且有意义的形象。

叙事突围与英雄重塑

——关于徐贵祥长篇小说新作《英雄山》的笔谈

李炳银

视角独特的历史洞察

——评吴玉辉纪实文学《七副碗筷》

李炳银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夕,吴玉辉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七副碗筷》由中央党校出版社、海峡文艺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作品以真实独特的表达,为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增添了新的元素。

《七副碗筷》记叙了作者家庭中自奶奶开始流传下来的特殊祭奠方式:每年清明节祭奠自己的祖先先辈外,还要在自家窗台上摆放七副碗筷及各类供品,纪念当年被日本军机轰炸导致丧命的人们;在探究还原历史的过程中,展开了福建东山岛军民乃至闽南地区军民当年抵抗日军侵略、奋勇保卫家乡的动人故事。作品从“七副碗筷”这样一个很小的故事细节开始寻找求证,从一个极小

的历史窗口进入,展开了一幅英勇悲壮的抗战历史画卷,结构十分巧妙。如此真实、细腻、动人的文学书写,是对历史的真实追踪和形象呈现,也是对中国抗战题材文学创作的有益丰富。

在东山岛壮烈的抵抗战斗中,曾经涌现出朱九、郑南阳、黄桂这样拒绝金钱收买、宁死不屈、坚决不给敌船引航,最后遭杀害的英雄;也有对赴前线战斗的丈夫说:“拿着枪好好打鬼子,你要是战死了,我为你守寡,把咱孩子抚养成人。下辈子还做你的女人”的妻子;既有以张润生为队长的“敢死队”,也有在日寇袭击中遭受杀戮、凌辱依然绝不屈服的普通百姓。这些英雄的付出和牺牲,使得东山岛得以坚守不陷,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特别的贡献。

作者吴玉辉的母亲,承袭了婆婆每逢清明节以七副碗筷祭奠逝者的行为,并在年老时亲自将此事托付给儿媳,在细节上表现出对逝者的尊重和悲悯的情怀,从一

个独特的角度呈现出人性的深度与温度。《七副碗筷》记叙和表现的是东山岛上的抗战历史,相比于宏阔的抗战历史,这无疑是一个历史的小画幅。但是,这样的小画幅却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历史画卷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非常需要记录和书写。在表现人物的精神性格、心灵动机、情感世界等方面,《七副碗筷》也写得极富作家的个性和深情。

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说,坚持真实性的原则,既是作家的优势所在,也是对作家的实际考验。在这个意义上,吴玉辉实现了很好的平衡。开篇,作者便提出一个似乎是悬念的话题,然后开始寻找,经过层层剥笋式的叙述推进之后,作品最终真相大白。水到渠成,人物、故事都在寻找的过程中得到形象精彩的呈现。独特的观察,使作者获得了洞悉历史真相的视角,而贴近真实历史和生活细节的精准叙述,也使得《七副碗筷》具有了严谨庄重而又细腻动人的风格和气质。

立象当超越表象

吕国英

文艺探研

审美,探幽精神密码

笔者早些时候受邀观展,所见之作,虽题材不同、内容有别,但形式语言大都与对应的现实物象几近相同;甚至如物之映象一般,直挺挺、硬邦邦地杵在那里,不能对视、无法交流,寻觅美感更是奢愿,自然失望;但也觉得,或许参展作者艺高未启、初学涂鸦,照猫画虎,情有可原。后多遇此类情形,大多如观物象本身,不知展“美”何处。又觉得,或是由于展览组织层级较低,不能吸引艺术名家,导致展品仍在物象涂鸦层次。再后来,又多次走进较高级别组织之大型主题性或综合性艺术展,展前又被告之曰,领域名家均献力作,参展作品精挑细选,是大家雅集、名作荟萃,结果却每每乘兴前往、常常感叹而回——“物象”类作品仍是主角,只是比“基层”级题材更多、尺幅更大,形貌也更规整、更准确。

综观一个时期以来的美术创作,就艺术形式之不时如人意方面,我曾在一次研讨上发言,概括为几多几少:照片多了,虚构少了;俗见多了,陌生少了;描摹多了,挥写少了;具象多了,抽象少了;再现多了,表现少了;拼接多了,融合少了;写实多了,写意少了;理性多了,灵性少了……

就文学和影视领域的创作而论,有的创作者老于个人书斋,耽于一己悲欢、杯水风波,或述他见之见,或传他闻所闻,这样的现实题材类作品,还停留在自

然描述的层次上,几近是现实世界的翻版。毋须讳言,艺术创作的现实物象之对象化——以照相相形象,既是长期存在,也是普遍现象;是艺术病症,也是艺术顽症;虽多为人之诟病,甚至斥之、不屑,并为业界共识。为什么此症始终如影随形,难以祛除呢?

有道是,抽薪方可止沸,塞源才能断流。由于从事艺术者中不少人缺乏哲学素养,对哲学不感兴趣,甚至把哲学与艺术割裂、对立起来,对艺术的认知仅仅停留在自然主义的层面,满足于机械地再现现实或反映现实。而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也是极端自然主义的,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才是现实世界,超越世界中对象,比如人之灵魂信仰、宇宙之宏阔神奥,因为不认知、不追问,所以不在探究之列。如此,将艺术对象仅仅对应于现实物象,根本原因在于创作者缺乏哲学素养,缺乏深刻的思考能力。而补好哲学这一课,并尝试以艺术的形式关注与回答世界、人生的本质性问题,才是进入艺术的根本之道。

哲学,就其本源意义是“爱智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哲学开始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奇与疑惑。叔本华认为,对一个人而言,假如他看见的众人 and 万物都不曾时时看上去仅仅是幻象或幻影的话,他就不会是一个拥有哲学才能的人。黑格尔说:“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康德将哲学的终极问题归结为:“人是什么?”杜威说:“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海德格尔认为,哲学是要回答什么是“存在”以及人与“存在”的关系。质言之,哲学从对万

物的惊奇、疑惑到对世界、对人生意义的永远追问,最终聚焦在对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的根本性思考上,即对天我关系、人人关系、我我关系合理而又具有价值意义的探讨中。

显而易见,眼见为实式的艺术认知,与哲学无关,自然也艺术离得很远。从古典艺术到现代艺术的演进过程,经历了这种带有根本性的思想与观念的跨越,而从现代艺术到后现代艺术,同样表达与呈现了这种跨越,尽管这种表达还不“完美”,有的甚至走向反现代艺术的极端。然而,真正的艺术大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大家,正是因为他们具有一双艺术的慧眼。艺术史是艺术价值的最好解读,也是艺术未来的最好启示。在俄罗斯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上,有一特殊环节,就是将马列维奇、康定斯基、夏加尔,作为民族骄傲、人类艺术文明的重要使者和标志性人物隆重推出。之所以如此隆重地推介这些艺术大师,盖因他们的创作开辟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新视野、新高度与新通道,发现了世界存在的新秘密。

大家之所以是大家,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前者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认识世界的新途径,表达了描摹世界的新语言,后者矗立了世界存在的新形式,敞开了经验世界的新天地。

人类通过哲学实现自我认识,通过艺术实现自我映照。依“气贯灵象”艺术论,哲学之命题、艺术之语言,均属于超越领域,存在于超越世界。艺术创作要回应哲学追问,不负审美担当,就应当超越物象表象的遮蔽,沉入经典创造的存在之境。



向着胜利前进(油画) 高阳作



第4992期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

突破题材的窄化

丁松虎

锐观点

探研本质,开启新知

近年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英雄精神等方面,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受众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但是仔细梳理亦会发现,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也存在题材窄化的现象和问题。围绕同一重大历史事件或战争反复进行创作,固然因其时代和视角的不同会显露出某种天然的差异,然而如果对历史、战争缺乏进一步的深入探索,对故事、人物没有新的有价值的发现,就容易陷入题材的窠臼,导致某一题材被拍“滥”了,观众也容易产生审美疲劳。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有一块金属讲解牌向一拨又一拨的参观者“讲述”着陕甘宁边区“拔穷草”的故事,曾经是红军战斗英雄的肖玉璧,没有经受住“糖衣炮弹”的攻击,从一个历经生死考验的战斗英雄,蜕变成了贪腐堕落的反面典型。依据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1941年12月,肖玉璧被执行死刑。“肖玉璧事件”映照出了我们党从从严治党的历史足迹,当然也可以成为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生动素材。类似这样湮没在历史深处的鲜活素材和故事还有很多,尚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和表现。

有一次,笔者在井冈山革命纪念馆

看到了当时根据地制定的金融制度,其理念非常先进,各条款相当详细,着实令人惊叹。从这个意义上说,除了表现战争、重大事件、领袖和英雄人物,我们的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目光能不能更宽广一些?比如,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治理下的司法、金融、教育、医疗、婚姻等等,是不是也可以作为表现的对象和内容?这些领域何尝不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富矿”?

对这些“资源”进行深度开掘,一来可以填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上的某些空白,让作品中的党史、军史和国史更加立体丰满;二来可以吸引今天的受众,引发受众更加广泛深刻的情感共鸣和价值共鸣;三来也可以进一步诠释我们党的先进性、制度的优越性。比如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政策赢得了广大老百姓的支持,这也是我们能够赢得解放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可是今天的年轻观众,对这段重要历史又有多少了解呢?对于诸如此类的内容和领域,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不应该“缺位”“失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创作题材的窄化,不利于全面地、艺术地再现我们党和军队波澜壮阔的历史,也不利于充分满足当下受众的认知需要和精神需求。

当然,拓宽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内容和表现领域,也并非易事,仅是搜集素材就相当费功夫,这需要创作者静下心来,深入挖掘。近些年,已经出现了一些

这方面的作品,比如,表现建党初期党内监察制度的话剧《王荷波》,表现延安时期司法情况的话剧《黄克功案件》,还有表现八路军时期敌后金融战的电视剧《大金脉》等。目前来看,这方面的创作数量仍然较少,质量也亟待提高。

拓宽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内容和表现领域,也不能忽视文学改编影视剧及其叙事话语的变革。不同的媒介形式会让同一个故事“原型”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比如,根据周立波同名小说改编的50集电视剧《暴风骤雨》,2019年播出后就给观众带来了较为独特的审美体验,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同时,叙事策略与叙事手段的调整和创新也十分重要。文艺作品要讲好“红色故事”,不必局限于传统的传奇性叙事,生活化叙事也不失为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事实证明,在主题、情节和细节上进行更加细腻、真实、生活化的处理,往往更能够切中受众的审美心理和情感脉动。

近年来,国家实施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扶持工程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内容和表现领域,必将有力促进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道路也将越走越宽广。

(作者系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教授)